

相关链接

“协助自杀”争议

英国安乐死合法化支持者近两年才看到让他们高兴的变化,这要归功于政治活动人士黛比·珀迪发起的挑战。

珀迪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最终将生活不能自理。她想知道如果让丈夫奥马尔陪伴她到瑞士实施安乐死,丈夫会不会受到审判,因此要求总检察长对1961年《自杀法》关于“协助自杀”的内容作出进一步解释。

根据《自杀法》,协助他人自杀者将面临最高14年监禁。目前英国还没人因为陪伴家人赴外国接受安乐死而遭审判。

2010年2月,英国总检察长颁布处理“协助自杀”案例的新指导方针,指出像奥马尔这样明显出于同情而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者可免受法律追究。

2012年1月,“协助自杀委员会”进一步提出:如果患者能“实施终结自己性命的最后一步行动”,如推动注射器,法律应明确拒定在何种情况下绝症患者可在他人协助下自杀。

但这些新规定对尼克林逊没有帮助,他的病不是绝症,他思维健全,也没有能力“实施终结性命的最后一步”。正如他的姐姐金尼所说:“他所承受的痛苦是无法缓解的,它是精神上的痛苦。”

尼克林逊的妻子简曾是护士,如今在家中全职照顾丈夫。她说:“我知道,要是他有能力的话,他早就自杀了。”

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希望修改法律

英高位截瘫病人要求死亡权



■ 尼克林逊和妻子简

如此活着比死痛苦

58岁的尼克林逊曾经过得很精彩。他性格外向,幽默健谈,受朋友欢迎,和妻子恩爱,与两个女儿和她们的朋友也总能打成一片。

2005年,尼克林逊因中风而颈部以下瘫痪,失去说话能力。从此以后,生活像套上了枷锁,不能说话尤其让他痛苦。想与人沟通时,他有两种办法:要么让妻子举着一块写着26个英文字母的板,他用“看字母”的方式把单词拼出来;要么用一台能追踪眼球活动的电脑,他在电脑屏幕上看着想要的字母眨一下眼,电脑会记录下来,最后形成句子。这是个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

过程,有时尼克林逊会沮丧得哭起来,觉得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上个月,尼克林逊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予他选择安乐死的权利。由于他没有自杀能力,他希望修改法律,让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可以免受杀人罪起诉。

对残疾人“另类”歧视

尼克林逊的法律行动遭到反安乐死组织和残疾人权益团体的反对。他们认为,以往成功的安乐死案例中,病人要么罹患绝症要么承受剧痛,但尼克林逊的情况并非如此。假如法庭给他开了绿灯,今后被视为社会负担的老弱病残群体被“合法谋杀”的危险也会越来越大。

但尼克林逊很坚决。他说,假如时间能倒转,出事那天他不会叫救护车,而是听天由命。他通过微博客“推特”接受了英国《观察家报》采访,并回答“推特”用户提问。

一些反对尼克林逊诉讼请求的人提出,未来技术的进步会让他有可能更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或者“推特”这类网络社交工具能让他更安于现状,希望他改变主意。

但尼克林逊不为所动。“我可不想待在一个机器人牢笼中,就为了多活几年吗?不,谢谢。”“开口说话的能力对我很重要,‘推特’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他这样回答。

网上的尼克林逊语言幽默,逻辑清晰,这也反映了他目前状况的

残酷:身体被禁锢,思维仍在驰骋。

作为一个有主见的人,尼克林逊在关乎自己生死的问题上不希望受制于他人,包括法律和政府。在他看来,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也是残疾人受到的歧视。

为了“大多数人安全”

很多人虽然同情尼克林逊的遭遇,却认为不能放松对安乐死的法律规定,因为这等给了医生对老弱病残者“生杀予夺”的权力。

反安乐死组织“英国还没死”成员、残疾人士凯文·菲茨帕特里克说:“假如尼克林逊想要通过的法律真的通过了,我们在法律上就会面临一种境况,即某个群体的人可以判断另一个群体的人不值得生存。”

英国《独立报》一篇评论文章甚至说:“让你(尼克林逊)难过的法律会让大多数人更安全。”

尼克林逊回应道:“我觉得法律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反过来。难道《独立报》真想对我说,我必须为了大众利益牺牲自己的生活?难道它真想让我相信,那些能搞清宇宙起源的聪明人竟不懂得怎样修改几条简单法规,好让需要保护的人得到保护?让我这样的人得到帮助?”

法院判决可能在9月公布,如果不能得偿所愿,尼克林逊打算继续上诉;如果还不行,他甚至准备饿死自己。有网民问他是否害怕死亡,他说:“不,我害怕又老又弱的时候还过着这样的生活。” 沈敏

无辜被关地牢受尽折磨 失去情报价值莫名获释

他在美国反恐战中“被失踪”

自“9·11”袭击以来,一些国家为“配合”美国反恐,秘密逮捕大批恐怖嫌疑人并交给美国审讯,其中大多数是无辜者。在“失踪”的日子里,这些人饱受折磨,苦不堪言,却无处申诉。坦桑尼亚的苏莱曼·阿卜杜拉(见右图)就是这样一名美国反恐战争受害者。

秘密监狱关五年

美国《国家》杂志记者格特里奇在搜寻美国反恐战争中“被失踪”的囚犯信息时,开始关注坦桑尼亚人苏莱曼的案例。当他终于见到苏莱曼时,听他详细讲述了过去几年的遭遇:2003年,他在索马里被当地军阀逮捕,后辗转肯尼亚和吉布提移交给美国,在位于阿富汗的秘密监狱里呆了5年,受尽折磨。最终,他得到一张纸片,证明他无罪。

2003年,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苏莱曼被索马里和肯尼亚安全部队逮捕。后期报道盛传苏莱曼已被送往美国接受审讯,罪名是涉嫌参与1998年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使馆爆炸案。



事实上,苏莱曼从来没到过美国,他只不过是众多失踪囚犯的一员,关在秘密基地,无法接触律师。

格特里奇直到2008年才从一个秘密渠道获知,苏莱曼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美军基地。一年后,苏莱曼获释,回到坦桑尼亚。

笼中之鸟受虐待

苏莱曼说,他初到位于阿富汗中部的地下监狱时,一度以为回到了故乡桑给巴尔,因为到处弥漫着珊瑚礁的气味。心理学家后来解释说,人在承受极度压力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此类幻觉,大脑会让它们联想到某种熟悉的东西。

“地牢里一片漆黑,噪音不断,总是吃不饱。”苏莱曼说,美国审讯者用冰水浇他,说:“我们知道你是水手,但我们的水比海水还多。”

苏莱曼描述他遭受的吊刑:双臂被锁链绑着,脚趾刚刚触到地面,审讯者还把水壶嘴戳进他的直肠。

2003年苏莱曼被带到巴格拉姆。“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1075。”美国守卫对他说,“有5条基本规定:1、不准交头接耳;2、不准东张西望,把头低下;3、严禁在牢笼四周游荡;4、不准自言自语;5、不准奔跑。”

在巴格拉姆,苏莱曼从未见过太阳,他喜欢看小鸟飞过房梁,然后俯冲下来啄食,心想:“瞧我今天的遭遇!我成了笼中之鸟,我在笼里,它们却是自由的。”

2008年苏莱曼获释,原因不明,很可能因为美国认为他没有什

么情报价值,而且不构成威胁。

“行为异常”后遗症

2010年春,一支美国法律团队带着几名医生找到苏莱曼。他们专门评估和治疗遭受过折磨的受害者,帮助他们申诉并重建生活。

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医生罗斯比对苏莱曼作出的评估是“行为异常”。“他受过的虐待包括拷打、长时间幽闭、强制性裸体、性侵犯、双手铐着躺在湿垫子上然后像裹尸体一样被卷起来等,触目惊心。”罗斯比说,“听他讲述自己的遭遇,好几次我们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罗斯比认为,苏莱曼的苦难太过艰辛,不能对他置之不理。他们组建了一支国际支援队,为苏莱曼提供专门治疗,给他邮寄抗抑郁症药,定期上门看望他,罗斯比则坚持与他电话联系。

苏莱曼获释已有4年,曾遭监禁的经历持续困扰着他。和关塔那摩囚犯一样,他被无限期贴上“恐怖嫌疑分子”的标签,行动自由永远受到限制,一旦发生任何恐怖威胁都首当其冲受到怀疑。

这样的待遇非常不利于苏莱曼康复,他只能在家过着封闭生活,缺乏自信,不敢与人交往。因为不能自食其力,他变得更加抑郁。

罗斯比希望帮助苏莱曼前往英国一家折磨康复中心接受6个月深度治疗,之后让他回家做点小生意。他说:“苏莱曼现在对康复和未来萌发信心,我也希望这能弥补我的国家造成的伤害。” 唐昀

相关链接

关塔那摩监狱

关塔那摩监狱位于古巴东南端关塔那摩湾,美国20世纪初在这里建立海军基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拒绝撤出。

2001年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2年1月,美军在关塔那摩基地设立监狱,准备临时关押在阿富汗抓获的恐怖嫌疑人。1月11日,首批大约20名在押人员抵达关塔那摩。

这种临时关押逐渐变为“永久关押”。关塔那摩先后关押779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以及其他恐怖嫌疑人,其中多数没有受到起诉或审理,一些人死在狱中。美国把他们列为“敌方战斗人员”,拒绝给予《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俘权利,引发争议。

随着美军一系列虐囚事件曝光,关塔那摩监狱恶劣状况受到国际关注。联合国调查人员收集的照片和录像等证据显示,部分在押人员遭到毒打、强制脱光衣服或强行喂食。

联合国2006年2月发布报告,认定关塔那摩监狱存在虐囚行为,呼吁美国关闭这座监狱,公平审理或释放在押人员。一些西方国家同样敦促美国关闭监狱,但美国一直拖延。

《关塔那摩和总统权力的滥用》一书作者马古利斯说,苏莱曼的情况和关塔那摩囚犯类似,在有限条件下,他们可以寻求法庭释放,但仅此而已,“任何要求美国对无辜者赔偿的建议都属无稽之谈”。